

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



电通影片公司明星群像

臧杰 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Chinese cinema came to a critical period of its development in the 1930s when the Japanese imperialism fastened its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and nationalism of Chinese people was reaching an unprecedented point. Thus cinema was required to meet the new historical demands. Just then, the underground intellectuals, led by CPC set up a film group and launched a New Film Movement (Xin Xing Dian Ying Yun Dong). They brought Marxism into filmmaking and film reviews and fought with the official ideology of KMT. In the result, they created a road of realism for Chinese film and achieved tremendously in film production. Led by the progressive left-wing of the Chinese

Left-wing films, initiated and led b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domestic national struggle and class conflicts at that time, were a significant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nema. The film movement in China made their debut in 1933 and started the stage of history in 1937 with the overall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coaction of such historical composition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had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ir specific connotation patterns as well as the active aesthetic features.

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

——电通影片公司明星群像

臧杰 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电通影片公司明星群像 / 臧杰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117-0835-9

I. ① 民…

II. ① 臧…

III. ① 演员-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①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6014 号

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电通影片公司明星群像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叶 芳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总编室) (010) 66509236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66130345 (网络销售)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63 千字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66509618

演開月下——被攝意滿



新時代的本蘭 Miss Magallan's Character of Modern China



演維維波特昔日，
這維維波特是何因？
Once A Revolutionary
Was Returned
To Her Womanish mind!

春——司徒慧敏
夏——袁牧之
秋——許幸之
冬——李劫人

獸
年
ONLY
三句話不給
一文過五



目 录

引言：「电通」之谜

三个「波希米亚」

大明星·大导演·大人物

——光环下的袁牧之

退守自我和艺术的许幸之

唐纳：情爱至上者的归途

三个「摩登女性」

羽化的蝴蝶

——陈波儿的「角色」之变

王莹：文艺青年的洁癖与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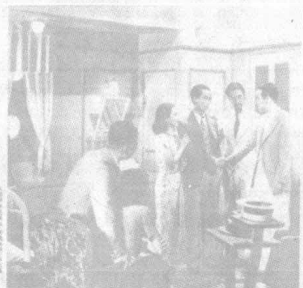
「上位」，以及继续「上位」

——1930年代的蓝苹

三个「八面玲珑」

孙师毅：「辣面书生」的歧路人生

品出司公通電 DENTON SOUND PRODUCT



品出司公通電
DENTON SOUND PRODUCT

（一）明星之地位
（二）明星之地位
（三）明星之地位
（四）明星之地位
（五）明星之地位
（六）明星之地位
（七）明星之地位
（八）明星之地位
（九）明星之地位
（十）明星之地位
（十一）明星之地位
（十二）明星之地位
（十三）明星之地位
（十四）明星之地位
（十五）明星之地位
（十六）明星之地位
（十七）明星之地位
（十八）明星之地位
（十九）明星之地位
（二十）明星之地位
（二十一）明星之地位
（二十二）明星之地位
（二十三）明星之地位
（二十四）明星之地位
（二十五）明星之地位
（二十六）明星之地位
（二十七）明星之地位
（二十八）明星之地位
（二十九）明星之地位
（三十）明星之地位
（三十一）明星之地位
（三十二）明星之地位
（三十三）明星之地位
（三十四）明星之地位
（三十五）明星之地位
（三十六）明星之地位
（三十七）明星之地位
（三十八）明星之地位
（三十九）明星之地位
（四十）明星之地位
（四十一）明星之地位
（四十二）明星之地位
（四十三）明星之地位
（四十四）明星之地位
（四十五）明星之地位
（四十六）明星之地位
（四十七）明星之地位
（四十八）明星之地位
（四十九）明星之地位
（五十）明星之地位
（五十一）明星之地位
（五十二）明星之地位
（五十三）明星之地位
（五十四）明星之地位
（五十五）明星之地位
（五十六）明星之地位
（五十七）明星之地位
（五十八）明星之地位
（五十九）明星之地位
（六十）明星之地位
（六十一）明星之地位
（六十二）明星之地位
（六十三）明星之地位
（六十四）明星之地位
（六十五）明星之地位
（六十六）明星之地位
（六十七）明星之地位
（六十八）明星之地位
（六十九）明星之地位
（七十）明星之地位
（七十一）明星之地位
（七十二）明星之地位
（七十三）明星之地位
（七十四）明星之地位
（七十五）明星之地位
（七十六）明星之地位
（七十七）明星之地位
（七十八）明星之地位
（七十九）明星之地位
（八十）明星之地位
（八十一）明星之地位
（八十二）明星之地位
（八十三）明星之地位
（八十四）明星之地位
（八十五）明星之地位
（八十六）明星之地位
（八十七）明星之地位
（八十八）明星之地位
（八十九）明星之地位
（九十）明星之地位
（九十一）明星之地位
（九十二）明星之地位
（九十三）明星之地位
（九十四）明星之地位
（九十五）明星之地位
（九十六）明星之地位
（九十七）明星之地位
（九十八）明星之地位
（九十九）明星之地位
（一百）明星之地位

（一）明星之地位
（二）明星之地位
（三）明星之地位
（四）明星之地位
（五）明星之地位
（六）明星之地位
（七）明星之地位
（八）明星之地位
（九）明星之地位
（十）明星之地位
（十一）明星之地位
（十二）明星之地位
（十三）明星之地位
（十四）明星之地位
（十五）明星之地位
（十六）明星之地位
（十七）明星之地位
（十八）明星之地位
（十九）明星之地位
（二十）明星之地位
（二十一）明星之地位
（二十二）明星之地位
（二十三）明星之地位
（二十四）明星之地位
（二十五）明星之地位
（二十六）明星之地位
（二十七）明星之地位
（二十八）明星之地位
（二十九）明星之地位
（三十）明星之地位
（三十一）明星之地位
（三十二）明星之地位
（三十三）明星之地位
（三十四）明星之地位
（三十五）明星之地位
（三十六）明星之地位
（三十七）明星之地位
（三十八）明星之地位
（三十九）明星之地位
（四十）明星之地位
（四十一）明星之地位
（四十二）明星之地位
（四十三）明星之地位
（四十四）明星之地位
（四十五）明星之地位
（四十六）明星之地位
（四十七）明星之地位
（四十八）明星之地位
（四十九）明星之地位
（五十）明星之地位
（五十一）明星之地位
（五十二）明星之地位
（五十三）明星之地位
（五十四）明星之地位
（五十五）明星之地位
（五十六）明星之地位
（五十七）明星之地位
（五十八）明星之地位
（五十九）明星之地位
（六十）明星之地位
（六十一）明星之地位
（六十二）明星之地位
（六十三）明星之地位
（六十四）明星之地位
（六十五）明星之地位
（六十六）明星之地位
（六十七）明星之地位
（六十八）明星之地位
（六十九）明星之地位
（七十）明星之地位
（七十一）明星之地位
（七十二）明星之地位
（七十三）明星之地位
（七十四）明星之地位
（七十五）明星之地位
（七十六）明星之地位
（七十七）明星之地位
（七十八）明星之地位
（七十九）明星之地位
（八十）明星之地位
（八十一）明星之地位
（八十二）明星之地位
（八十三）明星之地位
（八十四）明星之地位
（八十五）明星之地位
（八十六）明星之地位
（八十七）明星之地位
（八十八）明星之地位
（八十九）明星之地位
（九十）明星之地位
（九十一）明星之地位
（九十二）明星之地位
（九十三）明星之地位
（九十四）明星之地位
（九十五）明星之地位
（九十六）明星之地位
（九十七）明星之地位
（九十八）明星之地位
（九十九）明星之地位
（一百）明星之地位



后记

多少「光影陆离」
谈瑛的神秘与风情
「好好先生」周伯勋
「炸弹明星」陆露明
施超：吐尽最后一口鲜血
化作「白鹭」的白璐
在光影闪动之间
——吴蔚云·吴印咸·杨霁明
「剪刀手」陈祥兴
那些幕后的战歌
——聂耳的「电通」情缘
《电通》画报始末

司徒慧敏：从西装到中山装
海派江湖与时代漩涡
——应云卫的幸与不幸

引言：“电通”之谜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版图上，成立于1934年的电通影片公司并不是一间极具代表意义的电影公司，与其同时代的影片公司相比，在满足市民消费趣味方面它不及“天一”；在描绘都市生活、制造中产阶级消费情趣方面它不及“明星”；在艺术探索和文化品味建设领域，它又比不上“联华”；从营业之初到黯然“关门”，它只经历了大约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出品的影片也只有四部——《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和《都市风光》，甚至比起先“左翼”后“右转”的“艺华”，在社会影响力方面都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当我们展开“电通”公司的角色构成和发展历史时又会发现，这间短命的公司曾经潜伏着中国电影事业太多的“风云儿女”，而且这些人物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尽管那并不是一个擅权的时代，但“身份”和“重要”的标签却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曾经是开拓者、规划者、建设者乃至翻云覆雨者，他们之间的人事交往和人生纠葛，甚至可以称得上新中国电影历程当中最为刺目的部分。



在这间公司的所有核心角色当中，几乎每个人都可以称得上掷地有声，他们包括：司徒慧敏（前文化部副部长、电影局局长）、袁牧之（首任中央电影局局长）、应云卫（前上海江南电影制片厂厂长）、许幸之（曾任左翼美联主席、前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孙师毅（前中国电影资料馆顾问，行政待遇13级）、陈波儿（前中央电影局艺委会副主任）、蓝苹（即江青，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非核心人物也不是凡俗之辈，比如在“电通”时代干过摄影师的吴印咸曾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和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只扮演过小配角、担任过美工的蔡若虹也在后来走上了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岗位。即使后来没有与权力沾过边，在“电通”有过核心地位的王莹和唐纳，前者以“6742”的身份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而令人扼腕。后者虽然早早地隐居巴黎，但他与江青“不能不说的故事”常常引来传媒和著作作者的好奇。

对这些重要角色而言，“电通”之于他们电影生涯的意义，绝对不是一个短暂的驿站，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经由“电通”走上了电影事业的道路。相当一部分，是从电影业当中的微末角色，比如美术师、录音师转换成了摄影场主任和导演。

由此，这也使得“电通”在这些“风云儿女”的成长历程中，具备了不可动摇的重要意义，而所有与“电通”相关的缘起与发生，所有隐含在历史现场里的交互与交往，都显现出了令人倍感神秘的色彩。

其实，神秘又远远不止如此。

翻检主流中国电影史的经典文本会发现，“电通”一直是一间不可忽略的电影公司，上世纪60年代，由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①中，“电通”作为“左翼电影运动的新阵地”以专节的篇幅加以描绘，它被定格为“是党直接领导电影工作的成就，是这一时期电影战线上的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之一”；书写于新世纪、被广泛作为大学教材、由李少白主编的《中国电影史》^②，在提及“电通”的四部影片时则说，“左翼电影人的社会观念和电影意识在这些影片中得以集中体现。而与明星公司不同的是，电通公司是专为拍摄有声片而成立的，并将有声片的

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电影史料研究中，曹懋唐、伍伦编著的《上海影坛话旧》^③和朱剑、汪朝光著写的《民国影坛纪实》^④历来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著述，两著对“电通”也都有专文描述：曹、伍著中的《“电通”与党的电影小组》一文说：

“电通”刚刚宣布成立，反动派就到处散播谣言，说“电通公司是共产党的公司，左翼的公司，危险人物的公司”，甚至影片还没有拍出，就向电影院进行恫吓，不能放映“电通”的影片。电通摄影场周围，也经常为特务和“密探”所注视。朱、汪著中的《“电通”始末》一文说：1933年末的捣毁“艺华”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进步的左翼电影的“围剿”，使中共电影小组意识到……固守阵地固然必要，而开辟新的左翼电影阵地就更为迫切。因此决定着建立左翼影人自己的制片公司。

不难看出，无论“大写”的主流电影史，还是注重细节和发现的史料研究，都强调了“电通”与左翼甚至与共产党的关联。

饶有意味的是，这种影史书写和史料支撑，并没有使“电通”确凿地成为共产党革命斗争中的“秘密外围组织”，1983年5月26日下发的《中央组织部关于确定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及三联书店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组通字〔1983〕34号，也没有将



◎放映有声电影的光陆大戏院

◎南京大戏院

◎最早的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





◎电通三巨头龚毓珂、马德建、司徒逸民

司一影
概况片

飛花村

[illegible]

六、

○电通三巨头龚毓珣、马德建、司徒逸

要知道，何时“参加革命”、何时入党、生前有无出版过回忆录，以及身后在什么级别的报刊上刊发“讣告”，一直是那个年代的影剧界人士及其亲属普遍关注的问题。对应云卫而言，他的痛正是在“参加革命时间”这个“根”上。

这也就是说，关于“电通公司”，电影史的书写和组织史的判别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其差异存在的原因何在？它为何无法被列为党的“秘密外围组织”？那么多拥有过权力的“风云儿女”为何没有“改正”这一问题？难道只是因为这间公司太过短命？

而仅就“短命”而言，其谜相也非常之多，惯常的说法多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公司被封”，持这种论点的，既包括《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样的权威电影史，也包括诸多个人回忆。比如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的回忆；阳翰笙在《泥泞中的战斗》中的回忆；甚至包括当事人、资方代表司徒慧敏在《散记“左联”的旗帜下进步电影的飞跃》中的回忆。至于“反动派的迫害”是如何进行的，大都一带而过、语焉不详。

诸上的“神秘”、含混和模糊，都为研究和重述提供了理由。一个汇聚了五彩生命的“场”，一种矛盾交织的历史定位，一段由生到死的影业故事，因之而下的叙述就此展开……

从诞生与消亡说起

对电通公司“诞生”的情形，田汉的《影事追怀录》回忆了个“大概”：一九三四年春的某一天，我被邀参加一家新影片公司召集的会，那好像是在马德建先生的家里。那时候，有声电影已经很盛行。年轻的中国电影界也已经有几位专家创制了自己的有声摄影机。其中就有马德建等三位创制的“三友式”，他们把“三友式”做基础，创办了电通影片公司。司徒慧敏同志是这家公司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夏衍同志也参加了这家公司的创办工作。^⑥

司徒慧敏则述及过“缘起”：艺华公司被捣毁以后，左联党组织和党的电影小组决定要我尽快把试制的电影录音系统完成，并且把当时已经准备成立的“电通电影录音服务公司”改变成“电通电影制片公司”。我和一些熟悉的进步的专家商量，他们同意我们的建议，由他们出面组织了投资人，从此我就成为这个公司的资本家的代表人。而党的电影小组中夏衍、阿英以及田汉、阳翰笙、郑伯奇、于伶、孙师毅等人都是电通的特约编剧，是一些不挂名的、实际上的事业经营者和艺术创



作上的指导者和顾问。^⑦

在电通公司饰演过《风云儿女》女主角的王人美，她也可以称得上是电通初期唯一“专业”的电影演员。有关她加入电通的经历，曾有这样的叙述：“电通是1934年春天正式改为制片公司，开始拍摄《桃李劫》。对此，国民党反动派又气又恨，放出风声，说电通是共产党公司，左翼公司等等。所以电影界有些著名导演和演员不敢参加电通的工作，怕有朝一日电通被关闭，自己会背上和共产党合作的名声。电通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导演应云卫，演员袁牧之、陈波儿都是戏剧界人士。《风云儿女》是电通的第二部片子，导演许幸之、摄影吴印咸也都是第一次从事电影工作。这些情况我当时或多或少知道一些，不过，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只知道田老大是进步的，金焰和田老大很熟，要求进步，我也应该要求进步。至于我将来人身安全会不会受到威胁，别的电影公司会不会因此不和我签订合同等等，我连想也不去想它。再说我目前闲在家里，为什么有片子不拍呢？”

王人美的回忆是非常诚恳和现实的，由此也能够看出，有关电通影片公司成立时间“1934年春”的说法，也是被惯常采用的。

在电通影片公司当年的诸位“创设者”中，负责剧务、宣传、发行等方面工作的周伯勋忆及的时间比较具体：“电通公司从开办到停业，也就从一九三四年三月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这个短短的时间，日期不长，但对左翼电影事业却起了较大影响。”^⑧

电通影片公司最初的创设基础是原“电通录音器材工程有限公司”（亦称“电通制机厂”），这间公司是由司徒慧敏的堂兄司徒逸民和两个朋友——龚毓珂、马德建创办起来的。司徒逸民和合肥人龚毓珂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无线电专业学习，而福建籍的马德建则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机械专业学习过，学成回国后，正值中国电影进入有声电影的探索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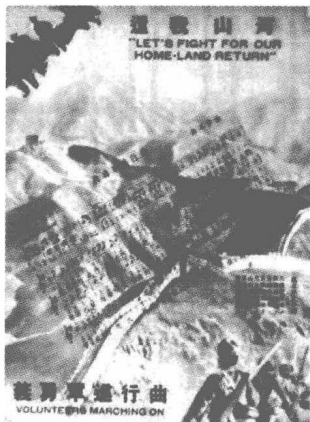
有声电影的兴起始于美国。1926年，美国华纳兄弟率先尝试拍摄有声片，并于8月6日首映，相对于无声片，这是电影发展史上的巨大革命，商业成功在所难免。四个月后，美国有声片来到上海，上海的百星大戏院率先引入特福莱有声短片，于

12月16日在虹口新中央大戏院试映，两天后又在百星大戏院连映六天，引发社会关注，影院还把放映机、影片和扩音器材陈列出来，供人参观。两年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又在四川路公所礼堂作试映。1929年2月4日，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公映美国影片《飞行将军》，正式拉开了中国电影业有声电影放映的大幕，随后，上海多家影院开始改装放映设备，放映有声片。但一些中小影院因为设备昂贵，而无力购买。1930年，上海华威贸易公司自主研发的“四达通”发音机问世，因为价格较低，使中小影院解决了发音设备空缺的难题。

有声电影放映市场的形成，势必推动有声电影摄制的开始。1930年，“明星”、“友联”等公司尝试蜡盘发音有声电影的试制，“明星”推出了《歌女红牡丹》、“友联”推出了《虞美人》，据“明星”自己的说法，《歌女红牡丹》历经五次试验才成功，共制成蜡盘18张。尽管困难重重，蜡盘有声片的放映效果却不理想。与蜡盘相比，片上发音效果要理想得多，但这些技术控制在美国公司手里，且使用条件苛刻，需要发行上的分成。

有声电影设备强烈需求的存在，诱发了司徒逸民的试制决心，自1931年至1933年，经过三年的努力，“三友式”电影录音机终于研制成功，而在“天一”公司工作的司徒慧敏也从中做了许

◎电通画报《风云儿女》的曲谱



多工作，包括找演艺界的人士过来试录唱片，1933年9月上海电通录音器材工程有限公司成立。

是年，“三友式”电影录音机获得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最优良奖状及“蒋委员长一万元现金之奖励”，电通公司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年鉴》里做广告说：“不让泊（舶）来品，联华巨片《渔光曲》、《大路》及香港全球公司之《野花香》、《回首当年》、《夕阳》等片，均系本机录音。”^⑨

电通公司最终由录音器材公司向制片公司的转型得益于司徒慧敏的“鼓吹”。而最初电通公司的选址就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吉益里博物院路128号器材公司的原办公地，据说公司最初也就是一个客堂间，里面有两三张桌子而已。公司最早拍《桃李劫》用的摄影棚是租借大华公司斜土路的一个小摄影棚，而公司基本演员的宿舍也是在斜土路上。

“电通”开拍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时，租借的是顾无为的摄影棚，刚刚拍完一个内景，顾无为就将影棚转租给了新华公司的张善琨，公司只好于1935年初，迁至荆州路405号，这里曾经是岭南中学的旧址，公司将该中学的室内篮球房改造成了摄影棚。^⑩后来的三部电影《风云儿女》、《自由神》和《都市风光》都是在这里拍摄的，第五部影片《街头巷尾》刚刚开拍，公司就结束了。

电通公司转型为影片公司后，确定的经理人是马德建，司徒慧敏任摄影场主任，公司最初的资本只有三万元。

三万元的资本量在当时大约相当于两部电影的制作成本，但因为公司搬迁和盖影棚的缘故，公司在拍摄《风云儿女》时就已经面临资金短缺的现象，并开始向银行贷款。

《中国电影发展史》里有关电通“结束”的说法是“反动派更加残酷的迫害”，司徒慧敏的说法是“重重迫害”，《民国影坛纪实》里的说法是“《风云儿女》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画面不清楚而影响了上座率”。

事实上，电通所拍摄的前三部电影，除《桃李劫》在票房上比较乐观外，《风云儿女》和《自由神》都不乐观，据张云乔回忆，开拍第四部《都市风光》

时，光袁牧之在音乐方面的支出就占了投资成本的大半，为了维持生产，公司向国华银行贷款四万元，以三个月为期限，以摄影机和录音机作为抵押品。

《都市风光》公映后，反响不错，银行方面将贷款延长一期（三个月），公司开始拍摄《街头巷尾》。

国民党对于电通的左翼倾向早有不满，除影片的主题外，还包括具体事件：1935年5月，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的主要负责人华尔敦被国民党军统抓获，因华尔敦被抓后一言不发，而被称为“怪西人”。华尔敦被抓的同时，该组织的外围人士袁殊也被抓走，而电通演员王莹与袁殊多有来往，有时候甚至会替袁殊捎信给夏衍^①，袁殊被捕后，王莹也被逮捕，其时王莹正在参与《自由神》的拍摄，并任女主角，“《自由神》里不自由”一时引起媒体哗然，王莹曾绝食三天表示反抗，后经三家铺保释出。

1935年6月，上海市社会局对电影界作了详细的侦察，并汇编成一份《抄共党在电影界活动情况》呈报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要求“严加取缔以戴反动，而肃乱源”，这份呈报就提及了“电通”公司。文中说：“电通公司又于去年下季扩大，所吸收之导演演员及编辑人才，几全为影联中人，其声势且超过从前，因电通之股东老板司徒慧敏得某要公之赏识，而袁牧之又有改组派为之掩护，应云卫拜黄金荣、杜月笙为老头子，绝非若艺华之铲共队名义轻易动摇之者。”呈报中还列出了一份“左倾电影从业员”名单，共计16人，其中列名“电通”的有8人，包括“导演”许幸之、袁牧之，“基本演员”王人美、王莹、陈波儿，“设计主任”孙师毅，“编剧主任”左明和“宣传主任”丁丁（注：左明时为新地剧社的组织者，“宣传主任”丁丁当时只有19岁，消息似乎不确）。

据说，在此前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还曾约“马德建、司徒慧敏、应云卫、袁牧之、孙师毅、许幸之、吴印咸、陈波儿”等8人到南京开会座谈，军统局第一处处长徐恩曾还在会上要求他们“以三民主义为本，免受异己分子利用”。

电通向国华银行贷款的事，被国民党中央党部获悉，遂以“代偿”的名义向国华银行偿还本息约5万元，由此成为电通的债权人。在电通公司提出可否延期到

（甲）有...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飛花村

一影片概况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九年...

《街头巷尾》摄制完成后偿还欠款时，有人开来一辆卡车，来人向马德建经理出示了契约，并将作为抵押的录音机和摄影机从车间搬出，扬长而去。

时任电通美术师的张云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分析说：“南京中央特务运用经济手段轻而易举地把电通影业公司封杀，这是最简捷而毒辣的一着。如果按照政治的途径封闭一间企业，由于当时电通影片公司的地点在租界上，必须经过特区法院的批准，手续繁多而更无充分的封闭罪状，法院不一定能够批准。如果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转移生产器材，就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因此，我认为电通影业公司在政治上是成功的，而在经济上是失算。如果在经济计划方面能精打细算，力争收支平衡，必然还能将第五部影片《街头巷尾》摄制完成。接着，把远景规划中的《压岁钱》、《皆大欢喜》、《沙漠天堂》等进步影片问世，可以为革命作出更多贡献。”^⑫

周伯勋则认为，除“资金周转不灵”之外，也存在着“恐吓”下，“主持人不敢继续投资”的因素，所以导致了公司的关闭。

如周伯勋所说，公司关闭的时间为1935年11月，是月的16日，第13期《电通》半月画报出版，这一期原叫作“革新号”的画报竟成了“终刊号”。

转型，以及“定性”

电通公司从录音器材公司转型为制片公司看似不难，这要得益于司徒慧敏从中的努力。这里面既有现实的考量，也存在着亲情的因素。

就亲情而言，广东开平的司徒家族在上海有广泛的人脉网络，而司徒慧敏的父亲司徒盛赞是加拿大温哥华的侨领，是早期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员。电通的另一合伙人马德建自华盛顿大学毕业后曾任江南造船厂的工程师，而司徒慧敏的另一堂兄司徒梦岩则是江南造船厂首任华人总设计师，其间的情谊也一目了然。就现实而言，1933年时，国产电影进入空前的发展期，洪深在《1933年的中国电影》一文中说，“1933年春天，一方面因为电影刊物和电影观众对于有进步意义的作品有了热烈而严正的批评和督励，他方面因为社会和世界情势的变迁，使中国的电影从业员

有一部到台電
表表華序明題

到
鹿雲衛

周
白
蘇

國海
的
風
潮

電通公司出品

民国影坛的激进阵营
——电通影片公司明星群像

们对于本身的任务有了更明确的觉醒，于是在这三、五年来沉沉暮气的中国影坛，又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生气。”^⑬

电通作为向电影业伸出半条腿的周边产业公司，在这样一种澎湃的局面下，介入电影业的生产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用电通公司在1934年《良友》画报第100期“公司说明”中的说法是：可以说在“心向往之”的情景下，欲在“电影花园里谋求一片领地”。由此，电通也就顺利扩张成了辖有制机厂和制片厂“两部”的电影公司。

而对司徒慧敏等人而言，建立自己主导的影片公司，无异于一块最正面的阵地，也是党的电影工作某种正面开始的象征。

1933年3月，经瞿秋白直接授意，共产党“电影小组”成立，成员计有五名，分别为沈端先（夏衍）、钱杏邨（阿英）、石凌鹤、王尘无和司徒慧敏，其中沈端先任组长。

据夏衍说，瞿秋白在1932年与阿英、郑伯奇打入“明星”公司时，就曾告诉他“在目前不可能由我们自己拍片的情况下，在条件许可时，在资本家拍的影片中加进一点进步的和爱国的内容。”^⑭

1933年2月9日，夏衍等人先是主导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成立，会上选出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31人，夏衍、聂耳、沈西苓分别负责文学部、组织部和宣传部的工作。8天后，21岁的组织部负责人聂耳参加了影协的欢迎萧伯纳的活动，他在日记中这样说：“新关码头上拥着人群，‘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旗帜下站满了熟人。”^⑮

显而易见的是，影协和电影小组，都是共产党在电影领域采取旗帜鲜明、正面作战，并且加强组织领导的一种斗争方式。至于电通公司的转型，则是顺应这种斗争方式，实现自主阵地目标的一种努力。

而这种努力的“现实指导文本”则是1931年左翼剧联通过的《最近行动纲领——在现阶段对于白色区域戏剧运动领导纲领》中关于电影的部分。《最近行动纲领》共有六条，其中第四条中说：“除产生电影剧本供给各制片公司并动员加盟